

第 8 卷第 4 期 2015 年 7 月

Vol. 8, No. 4, July, 2015

# 国际高等教育

## 国际主题

|                           |     |
|---------------------------|-----|
| 国际化与全球张力：以史为鉴.....        | 127 |
| 全球高校网络展望 .....            | 130 |
| 双/多学位项目是否会导致“打折学位”？ ..... | 132 |
| 美国最优？——国际化方面可不好说.....     | 134 |

## 私立教育

|                      |     |
|----------------------|-----|
| 私立高等教育在新西兰的独特定位..... | 137 |
| 印度私立大学：答案还是问题？ ..... | 139 |

## 英国：问题和挑战

|                        |     |
|------------------------|-----|
| 英国科研实力：一直在不断提高吗？ ..... | 142 |
| 英格兰高等教育的跨国途径.....      | 145 |

## 拉丁美洲的问题

|                           |     |
|---------------------------|-----|
| 一位教授身价多少？——吸引优秀人才的挑战..... | 147 |
| 危机还是转机：拉美引进人才的新机遇.....    | 149 |

## 阿富汗的改变

|                           |     |
|---------------------------|-----|
| 阿富汗高等教育重建与改革中的艰辛.....     | 151 |
| 提升阿富汗高等教育体系自主权所面临的挑战..... | 153 |

## 国家和地区

|                           |     |
|---------------------------|-----|
| 非洲大学社区参与制度化.....          | 155 |
| 新自由主义管理下的澳大利亚大学：危机重重..... | 157 |
| 中国的合作办学：上海与深圳的对比.....     | 160 |
| 日本“顶尖全球大学”计划.....         | 163 |

|            |     |
|------------|-----|
| 新书速递 ..... | 165 |
|------------|-----|



## 国际化与全球张力：以史为鉴

Philip G. Altbach, 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终身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继任主任、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在过去一年中,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多地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日趋紧张,如巴黎就遭受了宗教基要主义分子的多次袭击。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这些事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思考。当今的全球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初衷是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推动国际合作,而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宗教与观念冲突正挑战着这一初衷。自冷战结束后,我们并未在全球范围内感受过这种紧张与动荡。那么,在关于如何应对新环境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 止战之战

中世纪的欧洲式高等教育与现在有一些相似之处:学者与学生具有流动性,并使用一门通用语言——拉丁语。到了18、19世纪,大学很大程度上变得不那么国际化了,它们各自采用本国语言,有时甚至禁止学者出国学习,优先考虑本国权益。因此,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国家化、去欧洲化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催动了国际主义的爆发。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因为正是这一进程塑造了当

前的现实情况。从一战的创伤中醒来,人们对学术界有着强烈的信念,相信其能够帮助建立国际团结,有助于共建和平。距离一战爆发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有必要清楚认识学术界在这些理想主义的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最终的失败。

欧洲带着深深的创伤从一战中苏醒。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与学者都想在欧洲范围内团结起来以助和平。战争冲突开始时,整个学术界被轻易地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背弃了启蒙运动的理念,这着实令人震惊。

1919年,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国成立;1925年,德意志国际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通常简称DAAD)在德国成立;1934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在英国成立——这些机构的成立,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庇护下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政治举措的实例。然而,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未能阻止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或是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平与合作的目标再次被反面政治势力所摧毁。在德国,这些举措的失败最具戏剧性,德国的高校直接参与了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

## 一场真正的全球战火及其后果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想象不到还有一场类似的战火——仅21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二战在1945年结束，又一波理想主义浪潮开始了。这一次，伴随而来的还有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对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承诺。殖民帝国的解体也使得新兴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新的局面。高等教育的合作再一次被认为是促成相互理解的方式，同时适度的交流项目得以推进，其中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the Fulbright Program）最为引人注目。在欧洲，国际高等教育活动主要着眼于学生与教职员由前殖民帝国向西欧的流动，但是这些活动相当分散且有限。在国家层面，至少在欧洲和北美，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家双边协议及合作发展项目中所占比例较小。在这些项目计划里，学术机构一般都是被动的合作者。

## 冷战与国际化的政治化

高等教育与文化精神生活一样，都成了那段时期意识形态争斗的走卒和前锋。“感觉不错”的时代只持续了几年，早在1946年苏联与西方的争斗就已经开始，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是冷战的重要部分，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以及强国间的政治斗争则是其核心内容。

受冷战影响，决定国际教育进程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理想主义，这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尤为突出。而欧洲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第三世界才是国际教育合作与斗争的主战场：那里有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和体系，有英语语言的影响，有国外培训的冲击，有西方科学产品、思想和结构的

主导。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国际高等教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新殖民主义及西方高等教育霸权有关。就其本身而言，苏联也进行过类似的过程来扩大其影响力。在欧洲，“铁幕”（Iron Curtain）将中东欧与西欧隔开，也阻止了除最基本的高等教育合作以外的其他所有合作。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充分恢复过来并且开始其整合进程时，一种新型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才开始浮现，它专注于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学术合作交流。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某种程度上为学术合作打开了大门。

就像与苏联的关系一样，当时西方的对外学术政策也是与冷战中的权益直接相关。前殖民势力，即英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荷兰，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奖学金项目、校际合作以及其他一些计划来维持其在前殖民地的影响。这些措施同样直接叫板苏联。

作为冷战中与苏联旗鼓相当对手，美国建立了积极而深远的高等教育“软实力”措施，比如：1946年，创立了“富布莱特计划”；1958年，确立《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该法案是对前一年苏联发射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 I*）的直接回应；1960年，颁布《高等教育法》第六款（*Title VI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0*），旨在促进区域研究、外语中心、国际研究和国际事务项目的发展。许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其他一些组织资助的学术合作伙伴项目，在美国大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间建立了联系。这些举措必须要置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中来看，因为美国当时正努力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者。

## 冷战之后：日益提升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20世纪80年代，中东欧与西欧、美国之间的学术合作越来越多。然而，学术合作仍然主要是政治问题，因而缺乏机构与个人的自主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铁幕倒塌，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才得以快速增长。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和各国政府都开展了多种项目，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交流合作。欧共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于1990年创立了“跨欧洲高等教育合作计划”（the Transnational 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 for University Studies scheme），最初参与国只有匈牙利和波兰，多年后扩展到其他的中东欧国家。另一个国家层面的举措是奥地利政府的“西帕斯项目”（CEEPUS）。这些措施不仅为这些国家加入欧盟（the European Union）的常规项目——如研发框架计划（the Framework Program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和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奠定了基础，还被视作是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试验地。毫无疑问，无论对欧盟“核心”成员还是更广泛的欧洲观众而言，大批由欧盟资助的交流、研究与合作项目，都是与欧盟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挂钩的。

## 政治与国际高等教育的组合

鉴于对欧洲一体化批判的增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增长，以及俄罗斯、西欧和美国三者间的紧张局势，我们会再次目睹欧洲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和去欧洲化吗？

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主导。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冷战时期，学术合作与交流是国家间的主要联系：这些活动持续开展，同时受到外界的推动，以期为进一步的联系奠定基础。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国际高等教育与其在早期历史阶段时的状况已全然不同，和冷战时期也不一样。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政治与学术影响力的日益加深，国际高等教育的范围也不一样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现实一些，因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并不是和平与相互理解的保证，而是保持开放沟通和积极对话的必要机制。那么，日趋扩大的全球冲突，包括宗教原旨主义、复苏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挑战，会不会损害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中已取得的卓越成就呢？

注：本文为缩减版文章，原文发表在《国际教育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年第19卷第1期）上。

## 全球高校网络展望

Robin Middlehurst

英国金斯顿大学 (Kingston University) 教授

电子邮箱: r.middlehurst@kingston.ac.uk

几个世纪以来, 高等教育一直是提供国际交流联系的平台, 学者们从中交流思想、获取新知识。然而, 目前这种联系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度; 毫无疑问, 进行实体和虚拟联系的技术能力是其助力之一, 但也还有别的原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克里斯·奥尔兹 (Kris Olds) 探讨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协会、网络、联合会和联盟”, 他表示,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去国家化的进程——高校在国家范围之外重新定义它们的形象、结构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项针对 19 世纪后期到 21 世纪早期国际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研究发现, 那些试图让高校国际化“去国家化”的办法通常都以失败告终 (或持续不久)。那么, 在全球高校网络仍在扩张的同时, 高校向国界之外发展的各种努力为何注定失败呢?

世界大学网络 (Worldwide University Network) 的学者开展了横跨欧洲、亚洲、澳洲以及南北美洲的历史性合作研究。研究认为国际联合会与网络的发展其实是对高等教育中重大历史结构变革的一种反应。许多大学联合力量, 希望在“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满足新的期望并解决问题。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入学人数和科研经费随经济繁荣与萧条而不断波动; 促进学生、学者及知识本身三者之间学术流动的传输交流新途径不断发展; 对于应用科学、专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

需求不断增加; 以及意识形态随着制度变化而发生重构。作为建立全球高校网络的驱动要因素, 这些挑战仍然存在, 不过如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

竞争压力鼓励高校和国家通过合作来寻找竞争优势。人们对“世界级声誉”与“世界级水平”的渴求推动了排名、定位、品牌以及声誉管理。在全球性媒体的势力与影响力无处不在的 21 世纪, 在新兴社交与移动技术的支持与扩展下, 上述驱动因素也许比以往更强。与那些成绩斐然、资源充裕或是声名卓著的高校往来可能会带来附加价值, 这些附加价值不但有实质性的益处, 也有间接带来的荣耀。被邀请加入一个专属的高校网络 (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和“21 校联盟” [Universitas 21]) 标志着相互认可, 也标志着参与院校的质量在全球学术研究等级体系中有目共睹。对于其他那些还在寻找全球合作伙伴的高校, 想要在拥挤的高校网络市场中显示出差异性和独特性, “探究性研究”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即传统学术) 之外的因素也相当重要。

### 全球网络的多样性

全球高校网络不只是在高校间蔓延, 这些网络跨越各个行业以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它们利用合伙资产为企业、个人和高校谋求利益。三螺旋 (Triple helix) 创新体系是将传

统上分隔的创新源联合在一起的例子之一（创新源指产业的产品研发、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学术界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其目的是促进新组织设计、新知识、新产品以及新服务的发展。丹麦与瑞典之间新建立的跨海大桥促成了厄尔松大学网络（Oresund University Network）的建立，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新的教育机会。然而，最初有11所大学的高校网络如今已缩小，留下的仅是那些能够从网络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大学。利用长期以来的友好城市关系，英国伯明翰市与美国芝加哥市之间建立了新形式的文化交流，包含博物馆、剧院、美术馆及大学间的多种联系。企业也带头建立高校网络：桑坦德银行（Santander Bank）建立了“桑坦德银行全球大学部”（Santander Global Universities Division）以资助高等教育，称高等教育为“为社会发展繁荣做出贡献的一种方法”。如今，桑坦德银行已为17个国家1000所成员大学的发展研究、人员流动和奖学金提供资金。国际组织也促进了全球高校网络的发展，以此来汇集资源、解决紧迫挑战、推动社会发展。“联合大学网络”（Unitwin Network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一个包含24个国家650所高校的项目，“是学术界、民间团体、当地社区、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智囊与桥梁缔造者”。

### 多重主题

高校在全球网络中进行多主题的合并或合作，从而交换信息并交流好的实践经验，衡量其活动，通过科研和联合学位项目创造新知识，促进教职工与学生的流动性，优化与扩充资源配置，推动并宣传服务与价值观。主题类的高校网络包括：“欧洲首都高校联盟”（UNICA，包含35个欧洲首都城市的46

所大学）、“北极大学”（UArctic，合作高校联盟，包含与北极教育和研究相关的10个国家的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及其他组织）、“欧洲应用科技大学网络”（UASNet，包含9个国家的应用科技大学，由其全国大学校长作为会议代表），以及专注于远程教育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共同的价值观也推动着全球高校网络的发展。“塔乐礼高校网络”（Tallore Network）中的成员来自72个国家的320所大学，它致力于加强高等教育的公民角色与社会责任；“国际可持续校园联盟”（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Campus Network）有67所成员高校，遍布五大洲，致力于校园运营、科研及教学的可持续性；“风险学者网络”（Scholars at Risk Network）的高校、学术组织和相关联盟都倡议保护学术自由、高校自治，以及相关高等教育的价值观。

### 可持续性

当前部分全球高校联盟是新的：一些联盟已存在数十年；一些经历了重组（如“厄尔松大学网络”[Oresund Network]）；而另一些则已消失（如“苏格兰知识协会”[Scottish Knowledge]，一个跨11国的在线学习联盟）。过去的经验为高校联盟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线索，给我们的启示是：忽略或轻视文化、政治或智力的差异——尤其是错误地认为追求新的国际联系就是削弱了国家关系——必定导致失败。更为深刻的启示是，只要维持信任、努力以及高校资源的流动得以维持，每个成员必能从高校网络中获益。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高效管理跨越国际边界的高校关系，很可能成为维持全球高校网络的核心能力。

## 双/多学位项目是否会导致“打折学位”？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sympatico.ca

最近五年以来, 国际双/多学位项目的数量与种类激增。根据 2014 年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有关国际化的报告, 在过去的三年里, 专业领域的双学位项目数量增长了 50%, 自然科学领域增长了 19%, 社会科学领域增长了 14%。这些数字仅供参考, 并未体现出全部的增长, 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地区的增长。但是, 这些数字清晰地展现出了双/多学位项目在目前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 以及它们在学生与高校中的受欢迎程度。

### 学位差异

对双/多学位项目可以有多种解读, 导致人们对这一术语的含义有很多混淆; 因此, 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双/多学位项目”真正意味着什么、涉及到什么。一个国际的双学位 (或者多学位) 项目由不同国家的两所或更多的高校参与, 合作设计并开展这一学术项目。通常, 参与合作的每一所高校都会为学生授予学位。这类项目与联合学位项目 (joint-degree program) 或者联合导师培养 (cotutelle) 模式不同。联合学位项目只提供由两所或更多合作高校联合授予的一个学位, 而联合导师培养模式则是合作高校在学术项目发展和开展上进行协作, 但最终仅由学生的注册高校为其颁发学位。本文的讨论考虑到了上述三种方案, 但是只关注与双/多学位项目有关的问题。

### 双/多学位的学术工作被重复计算?

作为一种国际化策略, 双/多学位项目直指学术界的核心问题, 即教与学的过程和 国家间的新知识创造。这些项目建立在国际学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 能够给学生、教授、高校以及国家/区域的教育体系都带来重要的收益。当前人们对于双学位项目的兴趣激增, 对于这些项目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担心双/多学位的同一学分被重复计算。

人们之所以对双学位项目有各式各样的反应, 是因为项目模式的多样性; 新的项目提供者 (无论善意或恶意) 的参与; 项目质量监控和学位认可度的不确定性; 以及最重要的是, 在决定一个学生到底需要多少工作量且/或需要多少额外能力才可以被授予双/多学位时所需遵循的道德标准。对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 双学位项目是学生交换和流动项目的自然延伸, 因此受到欢迎。对其他人来说, 双/多学位项目则被认为是一个“伤脑筋的发展”, 会带来学术工作的重复计算, 因而损害一个大学学位的真实性, 并逼近学术欺诈的边缘。

### 对学生颇具吸引力

双学位项目吸引学生的原因很多。有机会在位于不同国家的两个或多个学位项目学习, 对于学生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道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一些学生认为合作项目一定是高水准的, 因为这些项目是由两个或多个大学的优势领域形成的。另一些学生对项



目的高质量则不是那么感兴趣，吸引他们的是“买一送一”获得两个学位的机会。学生们表示，较之于两个单独学位，双学位项目的时间更短，工作量肯定更少，而且经济负担随之也更少些。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这类项目，但这些说法确有可信之处。

传统的双联课程（twinning arrangements），是将原学校的学术项目和学位授予资格经合作交由另一个国家当地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现在，这一形式也转变成了双学位项目：虽然学生只完成了一所学校的项目学分，但是可获两个学位，即原高校授予一个学位，主办高校授予另一个学位。并不是所有的双学位项目都涉及学生流动，因为教授流动比学生流动更为经济，且现在虚拟课堂也变得越来越流行。最后，社会地位因素不可忽视。获得海外学历让人有种精英主义的感觉，即使该学生可能从未出国留学。

### 高校的得益与面临的挑战

这些项目对高校十分有吸引力，因其在课程创新、教授与研究人员交流以及获得合作学校的优势项目与关系网等方面能使高校在学术上得益；另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项目能提升高校的国际化程度，增强其国际声誉和排名。这就意味着高校会刻意选择与自己同级或者比自己高一层次的学校作为合作伙伴。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大学偏好与高排名的合作伙伴开展双学位项目，为的是规避本国的评审程序。而对于另一些大学而言，将参加双学位项目的学生数纳入统计能够增加其毕业生数并提高毕业率。

双学位项目的益处多且类别不同，带来的挑战也是如此。不同的监管体系、校历、质量保证和认证制度、学分体系、学费和奖

学金项目、教学方法、入学和考试要求、教学语言、论文评审等都是项目合作高校亟需解决的部分问题。

### 关键问题

通过对若干高等教育机构的双/多学位项目的分析，我发现并没有一个通用模型。事实上，各地情况差别巨大，也不应当存在这么一个标准模型。然而，随着双/多学位项目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重要的新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双/多学位项目的最佳认证方式是什么？是国家认证、两国间认证、区域认证还是国际认证呢？一篇毕业论文能同时满足两个研究型研究生项目的要求吗？国际合作项目是在鼓励英语的过度使用以及课程的标准化吗？追求社会地位和文凭主义动机最终会损害这些国际合作学历项目的质量与学术目标吗？倘若没有附加的内部或外部补充资金，这些项目还能维持下去吗？

### 学历的诚信问题与合法性岌岌可危

双/多学位项目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学术要求是什么、提供何种学位、该项目与联合学位项目的区别在哪里，建立对这些问题的共识是全球高等教育界都面临的挑战。联合学位项目是除双/多学位项目外极具吸引力的另一选择，但其面临着法律和行政壁垒，因为在许多国家，高校不能与另一国的高校合作提供联合学位。最为重要的是，一场针对学历认证、认可及“合法性”的严苛辩论亟需开展，以确保国际双/多学位项目能够得到全世界学生、高校和雇主的尊重与认可，确保人们不会认为双/多学位项目提供的是“打折学位”。

## 美国最优? ——国际化方面可不好说

Madeleine F. Green

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madeleinefgreen@gmail.com

美国称自己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的科研产出,然而其他国家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美国能在国际化方面宣称自己是世界领先吗?由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开展的第四次“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调查”(the 4<sup>th</sup> Glob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为比较美国与其他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看法与做法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调查数据显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 国际大学协会调查

此次调查于2013年开展,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共1336所高校的回复(回复率约为20%),其中有209所为美国高校(回复率约为14%)。为与国际大学协会所调查的全世界高校保持可比性,美国社区大学 (community colleges) 并未计算在内。在美国接受调查的高校中,49%的高校是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26%是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25%则只授予学士学位。近55%为私立非营利性大学,3%为私立营利性大学,42%为公立大学。国际大学协会调查中博士学位授予大学占到了66%。

调查报告分析了全球大学和区域性大学的问卷回复并强调了与之前调查的不同之

处。在区域分析中,北美地区由美国与加拿大组成。北美地区共有253所高校参与调查,其中209所是美国高校。

调查报告的结果聚焦了对高校致力于国际化问题的回应,内容包括对学校领导致力于国际化努力的想法、国际化战略的现状,以及基础设施支持等。同时,调查也考虑美国对其他地区高校的关注,这是美国高校国际化努力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国高校感兴趣的领域所在。

### 国际化战略

虽然绝大多数美国高校都在其院校任务声明以及/或者战略规划中提到了国际化,但其比率还是不及全部高校(86%的美国高校较之于92%全部高校。需要注意的是,此报告中的“全部高校”或“全球高校”也包含美国高校)。调查中,美国高校与全部高校相比,较少表示有国际化战略规划(43%较之于53%)。在表明正在筹备这一计划的美国高校和全部高校中,比例则大致相等(22%较之于23%)。有趣的是,在所有地区中,欧洲是最有可能拥有现成的国际化战略的地区(61%)。

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美国院校中没有国际化战略的院校比例高达15%,这是受调查的所有高校中此比例的两倍(7.5%)。

一些高校选择将国际化纳入总体规划当

中，而不是为国际化另设一个独立的计划。相较于接受调查的全部高校，美国高校总体办学规划中包含国际化的比例稍低（16%较之于19%）。

### 国际化对高校领导的重要性

有关高校战略规划的调查结果与国际化对于高校领导层的重要性一致。相比于调查中的全部高校，美国高校领导对国际化高度重视的比例更低。在接受调查的所有高校中，有69%的高校认为其领导者对国际化高度重视，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这一比率只有53%。而在高校领导者认为国际化不那么重要的比例上，美国院校所占比例是全部高校的两倍多（11%较之于5%）。

### 国际化战略与基础设施支持

高校支持国际化的能力是衡量高校致力于国际化的另一项有效指标。美国高校对国际化的典型基础设施支持，比全部高校少。所谓基础设施支持包括专门办公室、专门预算、监控或评价框架、明确的目标或标准等。另外，美国高校在其他院校政策中，也较少包含国际化的维度。

### 国际化在地域发展中的优先级

当前，越来越多高校开始关注自身在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国际化努力。稍多于一半的美国高校（52%）表示它们将国际化置于特定地理发展的优先级；全部高校中将国际化置于优先级的比例为60%。研究同时发现，欧洲高等教育机构最常将国际化置于地域发展的优先级（66%），而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该比例最低（44%）。

国际大学协会的调查指出，与北美合作并不是大多数地区的优先选择。一个重要的

发现是，对于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欧洲来说，排在地理优先级的首选是区域内合作。对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及中东地区而言，欧洲位居其合作地区榜首。只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接受调查的学校表示北美是其开展国际化合作的首选。北美排在中东地区国际化合作优先级的第二位；也是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开展国际化合作的第三选择。

在该调查中，大约一半的美国高校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列入其国际化合作地理优先级的前三位（列为第一的有34%，第二的有11%，第三的有4%）。第二优先选择区域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低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38%的美国高校将其列为地理优先级的前三位。其中，仅有7%将其列为首位，17%列为第二位，14%列为第三位。

亚太地区是北美招收国际学生的首要地区，紧跟其后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位列第三。反观其他地区，没有地区将北美列为其招收国际学生的首要目标区域。

### 小结

国际大学协会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高校并不像世界其他高校一样重视国际化。美国高校较少拥有现成的或正在制定的国际化战略规划；较之于其他地区，美国高校的领导者也表现得不那么重视国际化。从有关基础设施支持的所有指标来看，美国高校无论是在设立专门办公室、制定专门预算、制定监控或评价框架，还是设定明确目标或标准方面，都落在于其他地区的高校。

美国应当认清自身的相对地位，也就是对于其他地区发展国际化合作的潜在价值。当高校的目光望向其他地区时，北美通常不是首选。除了北美地区，欧洲是其他所有地区开展国际化合作的首要或次要选择。

国际大学协会调查的数据表明，美国不能再沉迷于“美国引领国际高等教育”这种陈词滥调了。全世界的高校与政府都在不断强化其国际化政策和战略。美国能够应对这

样的挑战吗？

注：本文的原文加长版本请见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电子出版物《趋势与见解》(*Trends and Insights*)。

## 私立高等教育在新西兰的独特定位

Malcolm Abbot

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副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PHE) 高级联合研究员  
电子邮箱: mabbott@swin.edu.au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稳固的、传统建制的公立高等教育院校。这些院校通常资源丰富,有招生补贴且声誉良好。因此,私立院校几乎没有在同一层面发展的空间。这一状况的典型代表是新西兰,该国的高等教育部门由大量政府所有的大学和理工院校主导。在过去的 25 年里,尽管公立院校在该国占统治地位,私立院校依然可以合法地提供高等教育(文凭及学位)课程。在此过程中,私立院校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公立院校的特质。这意味着私立高等教育院校规模虽小,但却是新西兰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新西兰高等教育院校共有 265 362 名全日制学生(学位及文凭项目),其中 38 964 名学生注册于私立院校,占总数的 14.7% (数据来源:新西兰教育部)。

为确保使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生存,立法改革在所难免。1989 年之前,高等教育课程都是由公立院校(提供学位的大学和提供学历证明的理工学院)提供的。1989 年颁布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 1989*)允许私立院校提供授予学位和学历证明的高等教育项目;同时使理工学院获得学位授予资格。之前的教育部发展成为“新西兰学历评估委员会”(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负责认证公立理工学院以及私立院校的新学历和学位项目。

### 受限的私立教育市场

20 世纪 90 年代,新西兰国家党政府曾通过增加招生资金的方式来推动私立高校的发展。同时,政府也认可私立院校在资金和生源方面与公立院校的直接竞争。这种态度在 1999 年工党上台后发生改变。从 2001 年开始,私立高校的资助名额被逐渐地强制冻结。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些经费应当分配给那些能满足公立学校不能充分满足的需求的高校。2008 年,国家党重新执政,伴随而来的人们对于增加拨给私立高校的资助,以及放宽私立高校申请限制的期望。然而这一切最终没有实现,部分原因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财政疲软,另外也因为国家党基本接受了上任政府对于私立教育的怀疑态度。

2013 年,新西兰共有超过 300 所正式注册的私立高校,而公立高校则由八所大学、18 所理工学院和三所毛利大学(wananga,以毛利文化为重点的高等学院)组成。私立高校显然体量更小,倾向于更专业化,专注于在专业领域内提供课程。和全球其他私立高等教育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新西兰的私立高校虽然也有文化艺术方向的课程,如创意艺术和教育,但主要以商科及信息技术课程为主。这种专门化是私立院校规模较小、可

提供课程范围较窄的结果。毕竟，公立高校只为私立高校留下了非常有限的机会。影响私立高校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也是私立高等教育受制于专业市场的结果——是其发展重点聚焦于学历资格教育，而不是学位层次的教育。私立高校拥有全新西兰35%的学历资格学生，但仅有3%的学位项目学生。

### 未来的“利基”机会

虽然受到政策强制限制，私立院校专业市场的发展还不止如此。公立高等教育的政策也对私立院校开放。公立理工学院一直试图将其办学重点从传统职业课程转向发展和提供学位层次的项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这种漂移就学术目标、地位和自身利益而言无可厚非，但它往往会损害预期的市场分化。不过，如果公立院校在此过程中出现失误或变革，那么私立高校就能获得一点生存的空间。社会若无法从公立学校获得某些主要需求的满足，便有可能从私立院校那里发现有用的贡献。

在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传统高等教育中的弱势学生群体创造了许多机会。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为学生提供非学术型教育方面。事实上，毛利与太平洋岛国学生

在私立高校的注册学生中占据较高比例，这说明大量私立院校在从事为那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学生提供学习项目的专业服务。但是，由于毛利大学的存在，私立学校的这种角色在新西兰受到限制。

总的来说，新西兰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属于“利基”院校。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专注于学历而非学位教育，聚焦在学历资质层面的职业课程。这意味着新西兰的私立高等教育无论从政策设计还是自然发展来看，都具有可辨识性；它们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不会对公立院校的学术主导与权威地位造成威胁。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职业导向型课程的需求，公立高校要么反应迟缓要么不愿应对，而私立高校通常反应迅速。这种专业市场配置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具有成熟教育体系的联邦国家中。

注：《国际高等教育》定期刊登“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的文章，“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的总部位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网址：  
<http://www.albany.edu/dept/eaps/prophe/>。

## 印度私立大学：答案还是问题？

Krishnapratap B. Powar

印度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 前秘书长、印度普纳 D.Y.帕蒂尔博士大学 (Dr. D. Y. Patil University) 校长

电子邮箱: kbpowar@gmail.com

作为一个多样性的国家，印度拥有丰富多样的大学。拥有学位授予资格、大学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可归入以下五个类别中，分别是：国家级大学、中央大学、州立大学、州私立大学及“准大学” (deemed universities)。这些高校的创办模式、经费来源，甚至功能都不相同，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其中，前两类大学依照《国会法案》 (Acts of Parliament) 建立，而后两类依照《州属立法机关法案》 (Acts of State Legislatures) 建立。准大学 (更准确地讲，是“被认为等同于大学”的机构) 的地位，则是由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依据 1956 年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Act) 第三节准予建立。在所属性质方面，前三类属于公立大学、州立私立大学以及绝大部分准大学为私立高校。

### 私立大学的角色

2006 年，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 (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 在其给首相的报告中强调，印度需要建立 50 所全国性大学，到 2015 年为止将大学总数由当时的 360 所增至 1 500 所。考虑到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教育界认为该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很简单，中央及州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资

金能为此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因此，资金必须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取。

影响私立高等教育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主要障碍是立法，因为法律规定教育是一项非盈利性经营活动。最高法院的确允许从学杂费收入中获取“适当”盈余，但“适当”一词却从没被量化过。而且现在的情况是，那些盈余还是要再投入到高校的发展中去。除非这笔钱是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供款的一部分而投资，或是用于慈善事业，否则它对精明而实在的商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是了解这一困难的，也曾建议采取行动重建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慈善捐款传统，而这正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建立的根基。建议指出，应当制定针对大学和捐赠方的激励措施。现行的税收法和信托法已成阻碍，需要进行修改。而且，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由掌握发言权的多个法定机构严格监管，即便是例行的学术事务也是如此。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受到过度监管却在治理上有所疏忽。但不幸的是，政府对此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 推动私立教育的举措

不是所有商人都认同教育工作者的怀疑论。许多人将专业性高等教育视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一旦某利益主体准备调整规则，他们便予以贿赂。通过引入适当法令，政府

试图推动私立院校更多地参与到高等教育中来。然而, 1995年, 中央政府的《私立大学法案》(*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Bill of 1995*) 没能在国会通过, 导致了“准大学路线”的出现。准大学地位通常授予那些久负盛名的、有卓越教学和研究传统的机构。在1958~2000年间, 44所准大学得到批准; 但在2000~2003年, 这种准大学资质被授予42所机构, 其中大部分是自筹经费的职业性高校; 之后的55所准大学中, 大部分仍是自筹经费。现在印度共有129所准大学, 其中89所是私立学校。

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对过去十年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并停止授予新的高校“准大学”地位。另外, 该机构还开始要求现有的准大学保证教学质量和可观的科研产出。通过《州属立法机关法案》建立州私立大学, 已成为私立院校进入高等教育行业的一条新的路径。大部分州要求的都是最低的资质条件, 这导致了州立私立大学数量的激增。当前, 在印度的21个州和联邦属地共有189所州私立大学, 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长。

在私立高校激增的情况下, 社会以及阶层区隔开始出现。对于一些人, 至少是经济中、上层阶级来说, 要获得相对高质量的教育, 私立高校不啻为一种解决方案。另一些人认为私立高校是不平等的本源, 也是腐败的源头。

## 私立大学的特点

私立大学主要提供专业学科教育, 即工程与技术、医学及相关卫生保健科学、管理学及教师教育等。私立大学总体上都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很多私立大学都有高素质且经验丰富的教师, 这多亏了规章委员会允许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可到70岁退休的规定(尽

管如此, 公立大学教师的退休年龄一般是58岁、60岁或是62岁)。这就意味着一名优秀教师从公立学校退休后, 能够继续在私立高校从事超过十年的教学工作。

人力资源发展部施加的压力, 迫使准大学开始提升科研, 引导学者在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多准大学现在已参与到前沿研究当中。如果依循国家评估与鉴定委员会(*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nd Assessment Council*)的评定, 私立准大学的教育质量优于绝大多数公立大学。粗略估计, 三分之二的私立准大学教育质量良好, 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州私立大学基本上为教学型大学, 只有少数学校进行了评估。然而不幸的是, 很多情况下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都值得怀疑。像美国的盈利性大学一样, 它们只提供核心的最少量的课程。如今很多私立大学开始利用校外的研究导师并招收大量博士生。这样的高校正在变成“博士学位工厂”(doctoral degree mills), 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私立大学的主要问题与实际管理有关, 其“元凶”是给予资助社团的受托人或是受托人团体。他们控制着所有资金交易, 从购买文具到购置最复杂的仪器。在教职员工的任命方面, 他们也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即便本应择优录取, 即由每年大学举办的入学考试决定, 但许多大学中的入学名额都受到操纵。政府试图只用全国性的入学考试来决定录取与否, 但这一做法一再失败。据报道, 大量资金秘密地以“人头费”的形式转移, 没有给学校, 而是流向了赞助方。私立大学学费高昂。事实上, 如果一个学生来自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 即意味着他不能入读知名的私立大学。许多私立大学在法律上是非盈利的, 实际上却是盈利性大学。对于富人来



说，私立大学是高等教育入学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对穷人而言，私立学校是不断扩大经济与社会差距的社会毒瘤。

## 英国科研实力：一直在不断提高吗？

Simon Margins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the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国际教育教授、《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联合主编

电子邮箱: s.marginson@ioe.ac.uk

英国高等教育系统每隔五年会开展一项由国家高等教育监管机构举行的大规模评估活动，该评估旨在汇编、计算、评价大学的科研情况。这个耗时而又充满竞争性的过程，曾被称为“研究评估考核”(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如今已发展成为“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研究卓越框架的首次结果已于去年圣诞节前发布。

### 科研评估目的

研究卓越框架有许多目标，各目标并不总保持一致。此框架用于分配科研专项资金，将资源集中到表现最好的高校和学科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科研资金的效用。它决定了学术就业市场，鼓励研究者跳槽至更优秀的单位，鼓励大学出资聘请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它也试图加强对高素质科研人员的关注，要求他们提交四篇最好的论文以供评估；也试图将英国学术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同时在此过程中向世界展现英国的科研。它也鼓励研究者关注科研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要求大学提交对此的证据资料。

作为科研真实质量的指数，任何研究评估体系都只是部分有效。科研评估有其双重性。一方面它植根于物质事实和客观方法，另一方面又有其所偏好的某一种标准、活动和兴趣——毕竟没有任何评估方式能够以同样方式覆盖到所有方面，每一种评估都是采

用特定的、有所偏好的方法。要与这样的规则体系博弈，经验丰富、地位显赫的选手总是赢家。

科研中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易标准化，例如，相比于科研对政策与业界的长期影响，顶级期刊的引用数就更易标准化。然而，学科之间、职能不同的大学之间、有经验的教授与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研究人员之间以及既定的想法与新想法之间，这些比较令人担忧。

英国研究卓越框架发布的结果部分取决于为竞争目的筛选并“包装”其数据的大学；同时，也受到研究卓越框架本身的学科领域委员会影响，该机构自行定义了什么样的研究才是世界顶级的。因此，我们在解读研究卓越框架发布的确切的大学排行榜名次时，应当有所保留。

### 衡量科研影响力？

研究卓越框架这一英国科研“影响力”指标在2014年的评估中初次启用，最容易受到操纵。因为衡量知识对社会、经济及政策的影响本来就非常困难，更不必说是衡量长期的影响。另外，通过研究卓越框架评估程序收集来的这些“影响力相关”数据，可能已经经过精心设计。为了产出那些有影响力的相关“证据”，一个复杂的产业已经出现。研究卓越框架评估的是模拟科研影响力，而非真正的影响力。

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研究卓越框架促使大家思考与科研成果的使用者之间的真正联系,这是大家在编纂影响力证明材料时的出发点。从最悲观的角度来看,对“影响力”的评估已沦落成一场镜中迷雾般的虚假活动,所产生数据的真实性并不比前苏联工厂应对官方调查时提供的证明好多少。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擅长于应对各种绩效考核的大学在影响力证明材料上表现得尤为出色。有人怀疑会存在“光环”效应,所有评估方法总会受到学校既有声誉的渲染。如此一来,剑桥大学的科研工作就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具有影响力的,就因为这是来自剑桥大学的科研数据。

### 衡量科研产出质量?

研究卓越框架中的科研产出质量通过一个四星评价体系进行测量,以此生成了一个基于高校研究人员平均星级(平均绩点)的排名,以及另一个基于拥有四星级研究人员比例的排名。这些科研产出的评估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委员会依据对实际科研工作的考虑而制定的。但科研产出指标的标准值,尤其是作为相对质量的衡量标准时,存在两大问题。

与2008年的“研究评估考核”相比,2014年的研究卓越框架中科研产出评价为“世界领先”(四星级)及“国际优秀”(三星级)的比例大幅膨胀。大学可以通过有选择地提交部分科研人员的工作至研究卓越框架,来操控评估结果。如,只选择那些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就可以提高该校的科研平均绩点以及四星级的比例。这样做的大学会在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其表象的科研规模缩水,相应的科研资金也随之减少。尽管如此,这种做法对高校声誉还是有利的,它会带来长期

的附带利益,包括经济利益。

2008年,接受评估的大学中14%的科研成果被评为四星级,37%被评为三星级,这意味着51%的工作评级表现良好。2014年,被评为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科研工作的比例猛增至72%,其中22%是四星级,50%是三星级。在这种“升级现象”发生的同时,高等教育的资源依旧被限制在原有标准内。如甲壳虫乐队的歌里唱的,“情况越来越好”,但英国的科研水平真的在不断提升吗?

虽然至少某些领域肯定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的规模和速度还是让人难以相信。有人怀疑这反映出的是许多因素的混合,催生了吹嘘浮夸之风。大学对于最大限度提升其表面质量有着既定的利益;学科领域的专门委员会对于最大限度提升其领域中“世界级”的名声也有着既定的利益。英国的高等教育在科研排名、博士生数量、海外收入等方面正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特别是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会在“情况越来越好”中受益。

研究卓越框架用于评估英国科研的全球地位的目的似乎已被其市场目标所掩盖。但这并没有损害研究卓越框架的其他目标,比如说分配科研经费、聚焦研究、调节国内就业市场,以及通过竞争推动科研。然而,倘若竞争加剧但标准过低,获得奖励的则很有可能只是竞争本身,而非真正“世界优秀”的科研工作。

对于英国科研而言,评分的膨胀反映的是该体系因为自身所定义的优秀而自鸣得意的回象,其状况令人担忧。这可不是推动长期进步的最佳途径。少一些骄傲自大,多一些中国式的务实精明也许对英国而言更有价值。之后的研究卓越框架应提升学科领域中国际舆论的作用,更加注重那些最需要提升

的领域。

今后的评估也应要求大学提供所有研究者的工作，或是提供固定比例（如前 70% 或 90% 的研究者）的工作。各大学都在实施不同的战略规划，而研究卓越框架没有对情况类似的学校进行对比。虽然每个人都将研究卓越框架作为相对绩效排名，但缺少对相同情况学校的对比会损害其有效性。

例如，位于高质量研究排名榜首的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该校规模庞大，其中 91% 的研究者被纳入评估。牛津大学排名第二，尤其在平均研究者质量

的指标中表现优异，在这一计数中统计了其 87% 的研究者。牛津大学最重要的对手，剑桥大学，其中 95% 的研究者被纳入评估，据此生成的平均绩点略低于牛津大学。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剑桥大学研究人员中最优秀的 87% 胜过牛津大学，而研究卓越框架却允许牛津大学操纵这一过程以将自己列为英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同时，卡迪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rdiff）在这一计数中只统计其 61% 的研究者，以此将自己推到了英国平均绩点排名并列第七名的位置。

## 英格兰高等教育的跨国途径

Janet Ilieva

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工作人员

电子邮箱: j.ilieva@hefce.ac.uk

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 跨国教育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正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项招生手段。从广义上说, 跨国教育指的是教育机构在其所处国家以外区域提供的教育。本研究首次尝试探讨英国跨国教育对英格兰本科学位项目的贡献。在英格兰, 用于招生的跨国教育项目被视为一种跨国升学的途径, 参加跨国教育课程的学生被称为跨国学生。我们的分析表明, 在 2012/13 学年, 超过三分之一 (即 34% 或 16 500 名学生) 的国际新生是通过跨国教育项目进入英格兰本科学位课程学习的。

从 2009/10 学年到 2012/13 学年, 来自中国的跨国教育学生人数迅速增长。这一时期, 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跨国教育学生数量增加了 55% (近 3 000 名学生); 而直接进入英格兰本科学位课程的学生综述增长为 18% (即 1 000 名学生)。马来西亚是跨国教育发展的第二大生源国。在英格兰, 约 63% (3 200 名) 的马来西亚学生通过跨国教育项目进入本科学位课程。

总体而言, 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和马来西亚的跨国学生约占英格兰本科学位课程中的跨国学生总数的 70%。除新加坡外, 中国大陆地区和马来西亚是英格兰跨国教育的两大生源国。

在英格兰接受跨国教育的学生, 其学习年限差别很大。2012/13 学年, 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跨国学生, 即 66% 的中国大陆

地区跨国学生 (5 450 名) 就读的是二至三年的学习项目。相比之下, 大多数来自马来西亚的跨国学生 (56%) 参与的学习项目仅持续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尼日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是除中国大陆地区与马来西亚外跨国学生最多的国家, 学生人数分别达到 550 和 500 名学生。来自尼日利亚的跨国学生, 似乎缓和了直接进入本科课程的跨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的状况。

### 项目时间短导致总学时缩短

跨国学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与一般的攻读本科学位的学生相比, 他们在英格兰花费的学习时间更短。据了解, 发展最快的项目持续时间为一学年或更短, 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比例从 2009~2010 年的 28% (3 700 人) 增加到 2012~2013 年的 33% (5 500 人)。学习课程时间的缩短部分归因于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产阶级的收入造成了影响。因此, 短期项目更加划算, 它可以为那些没有能力长期负担费用以及在经济危机后收入减少的家庭节省学费和生活费。

### 跨国学生在研究生项目中有优势吗?

大约有三分之一从跨国教育项目进入本科学位课程的跨国学生选择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由于在 2009~2010 学年前后各时间段的信息有限, 我们只能观察那些在 2009/10 和 2010/11 学年开始本科学位课程并

在两年后继续就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其中，5 100 名学生在 2010/11 学年开始了他们的本科学位课程，2012/13 学年继续研究生课程。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即 82%，4 130 人）来自中国大陆地区。

在所有来自中国大陆、从 2009 年开始攻读本科课程的跨国学生中，59% 进入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与上年相比，在 2012/13 学年，继续参与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总量多达 1 100 人，因中国大陆地区学生在这些学生中占大多数，所以这也使得参与授课型硕士项目的中国大陆地区学生人数增长了 45%。这一发现凸显了研究生学位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大陆地区学生在参与跨国教育的同时已决定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从英格兰跨国教育项目直接进入研究生项目的国际学生人数。

## 结语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拥有在英格兰开始本科教育的跨国学生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也是跨国教育的最大市场。虽然跨国学生的预期学时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和财政带来了一些挑战，但它也为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接受英格兰高等教育提供了

一条节省成本的途径。同时，项目时间较短可能让更多本来无法享受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家庭得到接受英格兰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长远来看，东亚跨国教育的有利环境将继续改善。在东亚国家开展的跨国教育项目中，中国大陆地区只认可马来西亚跨国教育项目授予的学位。2015 年，东亚地区高等教育系统的进一步融合将通过东南亚国家经济共同体（the Association of the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Economic Community）得以推动。虽然东亚地区除马来西亚以外，通过跨国途经进入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不多，但该数字仍有望增长。

通过提供跨国教育，全球性的大学更有可能顺利进入东道国的教育界中。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些大学可以从增加区域间学生流动、与该区域的院校建立深入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受益。

注：本文原文《游学方向：英格兰高等教育的跨国途经》（*Directions of Travel: Transnational Pathways into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可参见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hefce.ac.uk/pubs/year/2014/201429/>。

## 一位教授身价多少? ——吸引优秀人才的挑战

Marcelo Knobel

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物理研究所教授

电子邮箱: knobel@ifi.unicamp.br

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书中,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一项针对不同国家教师工资差异的比较研究(该书由阿特巴赫等人合编,书名为《教授待遇:全球薪资与合同的对比分析》[*Paying the Professoriate: A Global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and Contracts*, Routledge, 2012])。尽管他们做了相关研究,但报告给出的主要结论之一却是这类信息极难收集且不易分析,因为每个国家的津贴和福利各不相同,而且不同薪资水平反映了不同个体的职业道路。许多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稳固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吸引年轻且干劲十足的人才,对于卓越文化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也将为未来一代的教育提供支持。然而,在巴西以及许多拉美国家,尤其是这些地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基于学术绩效的薪酬模式难以得到认可。本文将圣保罗州的公共政策为例,旨在分析该政策在过去的60年间对圣保罗的大学吸引年轻人才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建立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产生的危害。

原则上,在巴西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由于工资标准被扣上了“平等”的帽子,有关工资和薪酬的数据应该很容易找到。不管业绩、影响如何,不论是否成功吸引更多的资金来源,政策规定凡是同级教师每月应当获得同样的薪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不仅是因为教师的薪金会随着工龄

自动增长,而且也因为教师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会增加额外报酬。此外,一些教师还会从津贴或是咨询工作中获得额外收入。更为复杂的是,教师薪资会因机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私有营利性院校、联邦私有非营利性院校、州立院校或公共市立院校的工资都各不相同。

### 薪资上限

近期在巴西引发热议的一个问题涉及圣保罗州的公立大学(包括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ão Paulo],坎皮纳斯大学[University of Campinas]和圣保罗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São Paulo])以及在拉美各类排名中普遍名列前茅的大学里的资深教授的薪资水平。自2003年以来,为响应联邦政策法规,圣保罗州已把公共部门的薪资与州长的薪酬联系到了一起,州长的工资即所谓的“teto”或“顶薪(ceiling)”,代表了公务员的最高工资。毫无疑问,这个上限可以根据政府权益下调,特别是在避免政府支出增多的时候。尽管州长每月并非只有固定薪酬,他/她还有许多非货币性的福利(包括住房、司机、餐饮等),但这也为平民化政策开启了大门。目前圣保罗州州长的每月薪水是20 662巴西雷亚尔(约8 000美元),其中含38%的扣税。因此,在圣保罗州,最高的净工资大约是每月5 000美元,每年大约是67 000美元的净年度津贴(12个月外加一

个月的奖金)。圣保罗的教授以及国家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最高工资由此设定,工作年限、个人功绩、声望、行政职责和任何其他因素均不予以考虑。

当前法律尽管自2003年起就已设定了工资上限,但是最近全国最高法院决定强制执行工资上限制度,即便现有工资水平已高于2003年之前的最大允许值。短期来看,一旦工资下调,许多已有退休资格的教职员工也将要受顶薪制度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在没有额外薪酬的情况下,很难会有资深教员愿意担任如系主任、本科协调员等行政职务。

### 吸引并留住人才的挑战

显然,有关教师工资上限的抱怨在这样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为724雷亚尔(R\$)(280美元)、平均工资低于2100雷亚尔(R\$)(800美元)的国度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性错误”。20000雷亚尔(R\$)以上的工资已是人们眼中的高收入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严重不平等的国度,拥有高工资的公立大学教师显然是处于社会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的。

然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圣保罗州以及该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些研究型大学对巴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巴西社会极度不平等的现象。

目前大学实施的“均等薪酬结构”不利于吸引最优秀的青年才俊来促进该地区新建大学体系的发展。事实上,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是未来科研、教学、服务质量以及跟上全球化步伐的根本所在。如果圣保罗的州立大学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那它们将如何维持现有的成功和发展势头呢?

一个资深教师的身价值多少?是什么让

一个青年才俊选择学术事业生涯?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巴西,大部分教师能够有较大的自由度追求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事业,这或许就是答案之一。然而,至少在巴西,还有其他的附带利益,包括全薪退休(不再提供)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尽管工作稳定,但最高职位所获的薪酬与企业私营部门(商业,服务等)相比却不再具有竞争力。此外,一个多年就职于某所大学的教师拿自己的最高工资与国际上同级别的教师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这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影响深远。

### 国家政策和学术卓越

原则上,大学是一个特权领域,精英体制应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大多数巴西高校中,教师无需有良好的业绩就可以获得相当不错的薪水。这一事实让更有能力的教师失去了不断提升的动力。此外,预设的顶薪制度使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难上加难。圣保罗州的大学将不得不拿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克服这一巨大障碍。

出于政治原因而限制职业阶梯顶层人员的薪资,会使他们在全国和全球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必然会损害近年来政府与大学合力构建的、不断成长的大学体系。不幸的是,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努力建设良好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公立大学是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些大学深受国家政策的限制,其需要合理财政补贴的学术系统分化也被抑制,因此,很难吸引青年才俊和有一技之长的教师投入到学术领域。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教授是学术界的核心,他们的参与、留任和动力是大学自身生存的关键所在。



## 危机还是转机：拉美引进人才的新机遇

Iván F. Pacheco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独立咨询师、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ivanfpackeco@gmail.com

拉美国家在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缓解这一压力，当务之急是建立培训高技能人才的强大师资队伍。然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严重缺乏培养、保留和吸引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大学培养的博士生不仅人数不足，博士课程也通常质量低下。此外，人才外流问题依然存在。然而，一切将会有所变化：发达国家博士生数量过剩、教师尤其是兼职教师（某行业专家，兼职在学校代课）的工作环境恶化，这些或许都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

发达国家许多领域似乎都出现了博士生人数过剩的现象，其中一些国家的学术职业也在走下坡路。在美国，多数教授职位都是兼职教授，非终身教职教授或临时教师。许多领域刚毕业的博士生很难找到好工作，有的甚至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这让他们读博期间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付诸东流。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学术无产阶级”（academic proletarianization）的现象。

学术无产阶级不只出现在美国，西班牙就是一个可供探讨的有趣案例。尽管西班牙各地区的差异显著，但其终身教授的薪资水平在欧盟国家很有竞争力。相比之下，以合约形式聘请的教授的工资往往非常低。加泰罗尼亚公立大学协会（Catal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Universities）的一项研究表明，加泰罗尼亚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月工资水平在409美元（教授职位）到1637美元（博士后）

之间。这一境况再加上西班牙面临的总体经济困难，使得许多潜在的教授纷纷离开西班牙去寻找更好的发展。西班牙主要报刊之一《国家报》（*El País*）以及其他媒体已多次提到这一现象。

与博士生过剩的美国、西班牙和其他发达国家情况相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问题：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和科学家的人数不能满足国家需求；而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博士生的速度无法填补这种空缺。拉美的重量级国家巴西，虽然是拉美拥有博士毕业人数和在读博士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仍无法弥补国内博士生的空缺。尽管巴西每年培养12000名博士毕业生，但每1000名25~64岁的居民中仅有1.4名博士，而这个数字在瑞士是23，在美国是8.4，在加拿大为6.5。

### 你的危机，我的机遇？

这种情况似乎是解决供需问题的一个经典案例。一些国家的高技能人才供过于求，而另一些国家对这类人才却是供不应求。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学术流动并不像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一样顺畅，而且吸引人才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一些拉美国家设计了很多吸引国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方案。智利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Chile）发起了“定期国际学术计划”（Programa

Académico Internacional Regular), 该项目吸引了大约一百名西班牙教授以及来自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学者。厄瓜多尔也许是拉美采取最积极的吸引人才策略的国家。为了提高国内教育水平, 厄瓜多尔的一些公立大学纷纷对高素质的教师人才(即硕士和博士生学位持有人)发出国际邀请。近日, 厄瓜多尔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Ecuador)向各领域的500名教授发出国际邀请, 在未来五年内这个数字将上升到5000人。虽然这种邀请不限国籍, 但厄瓜多尔政府主要针对西班牙国籍教授, 并在西班牙当地的各大出版物上挂出整版的邀请函。其兼职教师的薪资水平比西班牙提供的薪资更有竞争力。厄瓜多尔所提供的较高薪酬加上西班牙面临的经济危机都促使大量的西班牙人去申请厄瓜多尔提供的职位, 而那些应聘成功的教师则纷纷迁移到厄瓜多尔。西班牙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 有助于此项目的成功运作。

相比之下, 委内瑞拉正在遭受巨大的人才流失。据科学发展网络(SciDev.Net)报道,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在2011年和2012年间流失了大约700名教授, 而苏利亚大学(Universidad del Zulia)也一直没能填补1577名教学岗位的空缺。委内瑞拉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恶化, 大多数去国外完成高级培训课程的人已决定不再回国。研究人员、教师和高技能人才纷纷迁往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不同国家。

### 吸引本国人才还远远不够

许多国家集中精力物力去吸引那些远离祖国并决定留在国外的学者。2013年底, 哥伦比亚政府一家研究和创新机构, 即纪念弗朗西斯科·何塞·达卡尔达斯哥伦比亚科学

研究和特别项目基金(Colciencias), 开展了“该回国了”(Es Tiempo de Volver)项目, 该项目旨在吸引大约200名远居国外的研究人员。项目提供的薪水虽不能与那些移居国外的研究员的一般工资相提并论, 但还是相当不错的。该项目还提供税收减免、搬迁津贴以及研究经费。2014年4月, 在递交了申请书的10000多人中, 900位申请者是博士学位持有者。

自2003年以来, 阿根廷通过“阿根廷海外研究人员及科学家网络”项目(the network of Argentine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abroad, RAICES)已吸引了1000多名科学家。除了归国项目, 该方案还包括一个联络策略, 即不愿意回国的阿根廷研究员可以通过短期停留或远程指导研究项目(如学位论文等途径)与国内保持联系。

不同国家的举措成效各不相同, 但它们一般都存在同样的弱点: 他们只考虑自己本民族的群体, 却忽略了其他国家中愿意为寻求更好的经济和学术机会而迁移的潜在候选人。

### 结语

当教授决定移民别国时, 工资绝非是唯一考虑的变量因素, 但它却是一个重要因素。是否有强大的学术团体、科研和教学基础设施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也影响着教授们搬迁的决定。许多发达国家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人数过剩, 且年轻教授参与学术工作的机会渺茫, 这或许能为那些学术体系不健全但愿意吸引流散人员和国际人才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对那些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很少的国家来说, 招聘的人员仅限于同国籍者可能是种错误的做法, 因为越来越多的高技能研究人员和教授愿意跨国寻找良好的工作机会。

## 阿富汗高等教育重建与改革中的艰辛

Fred M. Hayward, Mohammad O. Babury

Fred M. Hayward: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资深高等教育专家、高等教育部任顾问

电子邮箱: haywardfred@hotmail.com

Mohammad Osman Babury: 阿富汗高等教育部学术事务部副部长, 喀布尔大学 (Kabul University) 教授

电子邮箱: deputyminister.mohe@gmail.com

阿富汗三十多年的战争造成一百多万人丧命, 六百万人流离失所, 其高等教育系统深受其害, 大部分高校受到破坏, 许多已停止运转, 女性失去教育机会, 一半以上的教职人员失踪。作为中东地区昔日的教育领先国家, 阿富汗当前的学术项目只是其曾经辉煌历史的一个躯壳。塔利班组织 (Talibans) 瓦解后, 阿富汗高等教育部面临修复和重建高等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

### 面临挑战

阿富汗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是战争的人力成本, 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其他心理健康疾病的高发病率, 这些问题对一半以上的学生造成了影响。补足战争中损失的一半教职员也是一项挑战。人事程序缺乏透明度。意识形态、民族和宗教成为招聘教师最重要的考察因素。高校招生考试 (Kankor) 也受到影响, 人们对此早已失去信心。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多其他方面都已瘫痪。科研无法进行, 高校对这些关键问题却没有可以向政府汇报的解决方案。留守教职工的知识水平早已与他们研究领域的现状严重脱节。

截至 2009 年, 受破坏最严重的高校修复工作已经取得进展, 高校的善后和整改计划

也有待出台。在学术事务部副部长的领导下, 指导委员会制定了《2010~2014 年: 全国高等教育战略计划》(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10-2014* )。它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增加入学率, 同时提高课程、监管、师资队伍建设和设施的质量。这一计划也带来了一些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改善的新政策。最终的验收评审工作定在 2011 年 7 月。到 2013 年, 12 所高校已完成院校自我评估, 50 名评审员也已到位, 并于 9 月开始三阶段过程中的第一步, 即对六所达到资格的高校进行评审。《2010~2014: 全国高等教育战略计划》的另一个目标已经达成, 入学率翻了一番, 入学人数从 2008 年的 54 683 人增加到 2013 年的 130 195 人, 比预期提前一年完成任务。私立高等教育在 2006 年以前是非法的, 其教育质量虽然良莠不齐, 但 2006 年之后蓬勃发展, 到 2014 年已经建成 90 个教育机构, 有超过 130 000 名学生。高校招生考试趋于合理化, 腐败现象得以消除。高校课程的评审和改革正在进行。到 2014 年, 公立高校中超过一半的课程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评审、修改和改革。

在高等教育部和妇女事务部的密切合作下, “高等教育性别政策” ( *Higher Education*

*Gender Strategy*) 在 2013 年得以发布。女学生的人数从 2001 年的空白增加到 30 997 人, 占全体学生的近 19%。但女教师的招聘工作不是很成功, 部分是由于女研究生数量很少, 只占总教职工的 15%。为确保女生人数增加, 高等教育部努力克服缺乏安全住宿的难题, 给女学生们修建了足够多的安全住房。三栋女生宿舍大楼正在建设, 其中两栋由美国国务院资助, 另外一栋由美国陆军资助。它们将为约 1 600 名女学生提供住宿。质量改善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只有 5% 的教师有博士学位, 32% 拥有硕士学位。高等教育部派出 1 000 多名没有高学历的教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中 750 名留学国外。他们当中的第一批将会返校, 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注入新的活力和热情。2012 年,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拨给高校的科研经费十年来第一次用在了教师身上。

### 挑战仍在继续

对于改善高等教育, 一直以来的一个主要难题是资金匮乏。虽然政府把高等教育列为首要任务, 但并不体现在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上。近年来, 政府对高校的人均拨款持续下降, 从 2010 年的人均 522 美元降到 443 美元。高校财政问题部分因为主要捐资方美国国际开发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缺乏捐助兴趣。大多数捐助者更关注初级教育, 全球都在为通过全民教育实现 2015 年普及初级教育的目标而努力。虽然我们也赞同这一目标, 但它带来的长期影响却是中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和随之而来更大的高校入学需求。

持续的战争、腐败以及管理不善使许多学生对高校失去信任和希望, 他们不知道在大学中是否还有自己的未来。我们在 2003 年看到的热情和乐观情绪已经转变为全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一个挑战是高等教育的中央集权管理。高等教育部致力于实现权力下放。2013 年 11 月, 高等教育部准予财政权力下放的提案获批。这将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允许他们通过创业活动获取办学资金。

回首过去五年的变化, 我们看到, 在很多重要方面, 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重塑科研氛围、提供更好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激励学生勇于创新、促进两性平等和扩大权力下放方面仍需改善。

高等教育部一直关注质量提升的关键领域, 主要包括: 建立评审制度、优化师资队伍、课程改革、严格恪守择优招聘和晋升政策。但在财政资源有限、腐败和政治干预方面依然存在挑战。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有一批充满责任感、任劳任怨的学者和致力于高校体系改革的管理人员。成功来之不易, 但维持、扩大和使这些改革制度化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是 2014~2015 年的挑战。我们相信持久的胜利属于我们。

注: 本文摘自《高等教育规划报》(*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中的文章《阿富汗高等教育: 质量、成败与改革的血与泪》(Afghanistan Higher Education: The Struggle for Quality, Merit, and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42, 2014)。

## 提升阿富汗高等教育体系自主权所面临的挑战

Joseph B. Berger, Hanni S. thoma

Joseph B. Berger: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教育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jbberger@educ.umass.edu

Hanni S. Thoma: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分校研究生助理

电子邮箱: hthoma@educ.umass.edu

据文献资料记载, 2001 年之前, 阿富汗的高等教育因近三十年的长期暴力冲突而受到严重影响。然而, 自 2001 年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一代年轻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望, 复兴高等教育的工作在持续开展, 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快速增长的国家新兴民主的要求。在过去的十年里, 阿富汗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加, 仅公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从 2001 年的 6 000 名增长到 2012 年的近十万人, 预计到 2020 年, 这一数字将超过 30 万。另外, 2015 年预计还会有十万名学生就读私立高校。公立高校因为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开放, 并且在阿富汗是久负盛名的合法学术机构, 所以公立高校依然是阿富汗高等教育的主力军,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来说都是第一选择。私立高校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大部分规模都很小, 社会认可度不高, 且不能满足最基本的学术要求。因此, 如果阿富汗想进一步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就必须使公立高校更加自主化, 私立高校更加规范化。

### 大学自治

阿富汗的公立高校体系是世界上最具有中央集权特色的体系。两年前, 高等教育部仍然掌握着每个高校几乎所有事务的决定

权。在国际资助团体的支持和帮助下, 高等教育部运用集权方式在扩大高校规模和提高高校质量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为了使高等院校获得更大的发展, 高等教育部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于 2009 年发布了《国家高等教育战略部署》(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呼吁把提升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作为首要任务。

但直到现在, 关于如何推进增加公立高校自主性工作的明确方案还未出台。政府大量的精力已投入到完善政策框架之中, 这为高校增加自主性提供了系统性的框架, 它不仅是推动改革过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实施政策的重要基础, 也是促进高校人员素质提升的重要保障。近来, 增强阿富汗大学自主能力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学术、行政和财务三个方面。

学术自治关注的是, 在提高质量保证体系的过程中强化教师和行政领导的作用, 这是以通过自主研究和校内同行互审进行评估的十二个国家的基础为基础的。这样的变化使高等教育部从严格的学术控制者的角色更快转变为学术协调者。

行政自治的重点是按照《公共财政管理风险评估办法》(th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Risk Assessment) 中六个关键方

面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这些方面包括组织领导、内部审计、财务和会计、人力资源、采购和信息技术。为了试验基本行政职能方面的行政自主性的提高，高等教育部着重建设部门和每一所重点公立大学的并行能力。

财政自治与行政自治的某些方面密切相关，但目前的重点是改革阿富汗高等教育金融法，该法要求免收学费并禁止大学私自保留任何自己获得的资金。这一法律调整对激励高校开发创新项目毫无帮助，这种做法也通常被认为会造成教师和高校资源的不必要流失。由于阿富汗政府缺乏资源来充分资助高等教育，高校不能自行引入和管理资金也是个大问题。事实上，80%的国家预算都来自于国家间的捐助团体，这至多只是非常有限的资金。四所高校正在试点进行有限的财政自治，相关法律有待修改，但这涉及到多个政府机构和委员会的审查，因此过程非常复杂。

相反，由于私立高校几乎不受约束，它们一直享有高度自治权。然而，高等教育部在2013~2014年期间开始对几乎所有被认为有教学质量问题的私立高校进行了第一次审查。不幸的是，由于高等教育部缺乏政治和财政资源，所以对于那些极度缺乏管理、一直都很落后的私立院校没有采取任何的标准化措施。

正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刚刚规定了高等教育部、质量保证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Quality Assurance）、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这四大组织机构各自的角色与职责。首先，高等教育部由不同的组织（部门、董事会和科

室）组成，是对国家所有高等教育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的中央行政机构，这一地位无法动摇。第二，半自治的国家协调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如质量保证委员会，正蓄势待发。在整个更加自治的高校体系中，他们的发展将对协调和调整政策、程序和实践至关重要。第三，公立高校仍然处于半自治状态（每一所公立学校都设置了不同的学院和部门），负责在全国直接开展高等教育，但在有关学术、行政和财务职能的政策决定和具体执行中，它们享有的自治权十分有限。第四，私立高校高度自治，高等教育部正考虑为它们制定新的质量保证系统。

## 结语

与国内其他领域一样，阿富汗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增强公立院校自治的政策框架和具体方案正在付诸实践。然而，想要每个领导和学术人员都有能力充分利用自主权增加所带来的机会还需要很多年去实现。与此同时，阿富汗缺乏对私立院校的管理，这一问题仍相当棘手。显然，随着私立院校持续的发展、规模的增大以及地位的提高，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质量、成本、自治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复杂性在不久的将来会得以解决。高等教育体系已经牢固地重建起来，这些变化会逐步促进一个开放的、可持续的高等教育体系质量的提高以及相关性的增加，随着阿富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慢慢步入正轨，这些变化将会为阿富汗从容应对各类挑战提供助力。

## 非洲大学社区参与制度化

Henry Mugabi

芬兰坦佩雷大学 (University of Tampere) 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Henry.Mugabi@uta.fi

虽然欧洲最早的大学源自专门的教学机构,但如今许多高校已经不仅仅专注于教学和科研,还扩展到社区参与和服务领域。非洲的大学也被要求在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服务社会。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的“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大会上,人们敦促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不断接触社会,并针对非洲问题调整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事实上,许多非洲大学,如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Nelson Mandel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博茨瓦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tswana)、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毛里求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uritius)、加纳大学(University of Ghana)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等都将社区参与列在他们的职能和优先事务日程中。此外,大部分大学都设立了如管理咨询办公室、继续教育中心、创业中心、技术开发和转让中心等组织,并指定了负责推动社区参与和/或协调社区相关活动的人员。

大部分非洲大学的社区参与仍然未实现制度化。大部分大学还没有完全把社区参与融入到他们的预算、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其教师聘用和晋升制度要么忽略要么没有足够重视教师在校外社区的贡献。内罗毕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成立的管理董事委员会

发布了一项报告,用以审查关于大学的培训和晋升政策。例如在有关教师晋升的标准上忽略了教师的社区参与贡献,却强调文章发表、学生监管和对其他教师教学经验的学习。即便是另外一些大学,如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虽然把社区参与添加到教师聘用和晋升的标准之中,但教师参与和社区服务这两项的加分却很少。此外,社区参与的资金大都零散不足或是依赖于外国资金。因此,大多数关系到项目的社区都是由个人或教职工团体发起的,因而不具有制度性,更多是个人性质的。那么,问题来了:非洲大学如何使社区参与制度化?

### 改进建议

在大多数大学中,社区相关的项目常常依靠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参与、投入及专业技能。因此,当有人离开或不再参与项目时,这类项目常常会中断或难以为继。非洲大学要想实现社区参与制度化,必须制定全校范围内的议程和制度,即政策、结构和实践,从而引导和促进学术单位、学院、职员、学生和外部社区投入到社区参与之中。除此之外,还要呼吁通过服务学习、合作研究和实习,把社区参与纳入院校预算、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在其他课程发展的活动中慎重参与社区活动。社区参与的制度化还需要高校领导的承诺和远见,他们的支持有利于解决那些对该项目不感兴趣的、持怀疑态度的教

师、工作人员、学生和外部社区所担心的问题。因此，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Nelson Mandel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设立了首席副校长办公室，负责科研和社区参与，这一做法值得称道。然而，社区参与的任务不应只丢给个别领导者，因为当大学的领导者不再负责这一事务的时候，对领导人的依赖将会削弱社区活动的可持续性。

如果不对教师的参与给予适当奖励，那么即便是设立机构、把社区参与融入大学的预算和活动中或是各级领导参与进来，都不能保证社区参与的完全制度化。任何一所大学的社区参与的制度化需要学院、职员、学生和外部社区的投入和参与。事实上，许多与社区相关的活动，如继续教育、咨询、合约性研究、服务学习、合作研究等都要依靠教师的联系、参与、知识和承诺。因此，除非非洲大学把教师社区参与的贡献纳入到教师的聘用、评估和升职中并予以适当奖励，否则教师会仍然认为社区参与不是什么重要责任，而且会阻碍自身学术职业的发展。

## 观察

虽然社区参与为大学和外部社区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利益，例如：利用外部资金、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获取高校的学术知识和其他资源，但是要实现非洲大学社区参与制度化，需要对“社区参与”一词有更深理解。社区参与往往定义为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大学的技术转移和衍生公司的建立。然而，社区参与还包括诸如政府和本地社区的外部社区参与并促进大学福利、参与并推

动大学的政策制定及大学的社会文化生活。因此，任何只注重技术商业化的社区参与制度化方法都可能会限制非洲的大学参与以及/或者服务外部社区的途径，因为非洲的大学并不是尖端领域创新的大角色。此外，虽然非洲大学应支持和鼓励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知识产出及发明的商业化，但它们的研究议程不仅应该强调应用型研究，也应该强调基础研究。因为非洲大陆的许多知识体系，如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马里、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都依托高校进行科学知识产出，因此，除大学外，非洲并不存在其他知识产出机构。

此外，社区参与制度化要求高校设立除其他部门外的专门单位，例如马凯雷雷大学的食物技术和创业中心、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的学术参与和协作中心、博茨瓦纳大学的继续教育中心以及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管理咨询办公室。为了促进社区参与并协调相关活动，非洲的大学应避免造成限制具体单位、学科和个人进行社区参与的筒状系统。同样，非洲大学的社区参与制度化要求各高校高度重视自身背景，如历史、学科重点、所在地、所有权、使命、文化、价值观、优先事项以及国家政策议程。因为即使同一个国家的高校，它们的院校环境、社区参与的重点、形式和组织都各不相同。考虑到这方面，再加上许多非洲的大学缺乏资金，每所大学进行社区参与的拨款系统应反映、符合并支持每所大学的愿景、使命、目标和社区参与的议程。



## 新自由主义管理下的澳大利亚大学：危机重重

Raewyn Connell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 raewyn.connell@sydney.edu.au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下半叶, 当时在动荡落后的殖民地居住区建起了一些小型高校。它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大学可以用来传播促进社会稳定的文化传统, 如用拉丁语引用贺拉斯诗歌的能力; 除了首先发扬欧洲人文教育, 还可以传授给年轻的律师、工程师、医生一些技术技能。然而, 本土知识和本土学生一样完全被排除在外。

20 世纪中期, 伴随着国家发展的议程, 这些大学成功完成了转型。澳大利亚当时正在进行工业化。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 澳大利亚需要更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并吸收更多的学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之前很少关注高校发展, 二战结束后, 该政府把不断增长的税收投入到扩建殖民时期的小型大学中去, 并在各大城市修建了许多“绿地”。于是, 学生入学率得以上升。

紧跟这些变化而来的是高校角色的转变。社会需要技术、尖端科学甚至社会科学, 这一观念传播开来。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的主战场。因此, 澳大利亚需要扩展科研能力。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澳大利亚建立了一所国有的研究型大学, 其他大学不久便开始推行高等学位教育。新的讲堂和研究所的基础设施也随之建立起来。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 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公立高校队伍。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这些学校在澳大利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立高

校是该国知识分子的根据地, 很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时期创建的大学体系是社会的重要资源, 虽不能与美国或欧洲相提并论, 但其品质卓越、普及度高, 且备受公众青睐。

### 新自由主义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 澳大利亚高校的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该国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 开始热衷于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管理权和短期利润等。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 澳大利亚恢复到了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 它削减了工业生产能力, 同时, 大规模的出口采矿业成为该国的主导产业。在当时的澳大利亚, 对知识自主创新的经济需求已不复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工党政府开始推行高校改革——和南方其他地方一样, 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也由“左翼”政党推出。出于社会因素, 改革政策旨在以最小经济代价进一步扩建高校。第一步是把非研究型高等教育学院合并为大学。改革并不是通过合理规划开展的, 而是由积极的、带有企业精神的接管者们(由学校副校长及工作人员组成)来实行。

下一步是找到资助人, 对此新自由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是在学费上做文章。联邦政府对大学投入的经费急剧紧缩,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约 90% 的大学预算下降到现在的 45% 左右。学生学费有所上涨, 大学数十年来以

上升学费来弥补缺失的政府拨款。另外一个途径是由外国学生付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作为发展援助,澳大利亚的大学为亚洲学生提出免费教育。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在新自由主义政府带领下,大学被重新定义为出口产业,即采矿业在文化层面的同义词。海外学生主要来自亚洲,他们成为市场可承受范围内的高端消费者。有的大学已经开始在海外建立分校,但却没有繁荣起来,这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大学没有足够的国际声望,也可能是由于学生留学澳洲是希望移民到澳大利亚。大多数来自海外学生的收入源自澳大利亚当地留学的学生。

## 蜕变中的大学

新自由主义不仅影响资金安排,也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副校长扮演的角色愈发接近企业首席执行官。对于那些较为幸运的副校长,他们通过开展管理工作成为了精英管理者,在企业化的环境中工作,获得了与在公司任职一样的薪金,即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报酬(含奖金)。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在学术、维护还是技术层面,高层管理者与为他们提供业务支持的员工日趋分离。文化鸿沟由此开始形成。

在商界,提高利润的一般方法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大学,最先感受到工资下降的是非学术人员。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和大学没有关联的公司。这样做可能会节省资金,但它必然会中断他们与教学人员的日常联系。

教学中的劳动力成本也不得不被缩减。一种办法是减少对教学工作的投入。1990~2010年间,在整个高校体系中,生师比几乎

增加了一倍。另一种方式是将员工转化为临时工。由于这不利于招聘市场,管理层没有透露这一信息,但据全国高等教育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计算,目前大约一半的本科教学工作由临时教师完成。

随着大学与社会的严重脱节,管理层增加了间接控制机制。基于计算机的控制系统日益冲击着大学的运转。这些系统体现出高校对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并且,这些系统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和科研进程,最终引起了公众的批判。

如今澳大利亚大学实行形同虚设的问责制。与此同时,他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公共关系策略,以吸引潜在的学生和捐助者并借此来美化学校的形象。世人幻想着企业式大学有着宽广的草坪、轻松的学生、愉快的工作人员、宽敞的楼房和澳大利亚式的永恒阳光。但是作为真理和严谨思想的承载者,大学的文化特质正在大打折扣。

## 目标和再生产的危机

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澳大利亚统治阶级并不需要一流的大学体系。那些跨国矿业公司乐于引入他们的技术。从建筑工地到赌场,获利的地方产业也不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付得起昂贵学费的富人阶层需要通过当地有声望的大学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国际商业学校。于是,经过选拔的老牌大学出现了,它们自称“八校联盟”(the Group of Eight)并声称自己是南太平洋上的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在他们看来,全国其他高校只有吃残羹冷炙的份儿了。

同时,担任本科教学工作的研究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为了养家糊口,经常在

教学的空隙时间，不顾安危地奔波于不同的校园间。澳大利亚的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可学术队伍非但没有壮大，反而在日趋衰退。

虽然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管理的政策是乐观的，但这只是市场战略的需要。美丽光环背后的现实是劳动力生存能力和知识文化生产及再生产方面日益严重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们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新的金融企业精英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如果日益严重的危机能够得到解决，这将是一个质的转变，高等教育的决策将由全社会对一流大学体系的普遍需求来决定，同时，也由那些保护前人创造的重要资源的大学教职员工来决定。

## 中国的合作办学：上海与深圳的对比

Ruth Hayhoe, Julia Pan

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 ruthhayhoe@sympatico.ca

Julia Pan: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项目高级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julia.pan@utoronto.ca

中国新成立的合作办学高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中国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要求中国和国外大学建立正式合作伙伴关系并获得批准。这一政策反映了中国对主权的担忧, 这种担忧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中国曾遭受到来自外国列强的侵犯。第二, 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已为合作办学高校提供土地和建筑资金做好了准备, 并将此作为提高他们业绩的指标之一。在本文中, 我们将概述上海地区的合作办学机构, 并与南方城市深圳的新举措做一个对比分析。

### 早期中英合作办学案例

中国最早的合作办学高校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 前者位于上海南部一个充满活力的港口——宁波, 后者则是在苏州园林附近。易峰 (2013) 最近发表在《高等教育报》(Higher Education) 的一篇文章简短描述了它们的历史, 同时对这两个高校进行了有趣的比较。

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当地一所现代大学的合作得到了宁波市政府的支持, 并建立了一个美丽的校园。相比之下, 利物浦大学 (Liverpool University) 选择与一所顶尖公立

工程类大学合作, 西交利物浦大学由苏州当地基金会资助建成。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广泛的用英语授课的文科课程, 这些课程的水平接近诺丁汉大学的自身水平。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则可参与一系列工程和管理项目, 学习重点放在创新教学和研究方面。目前, 两所大学的学生数量都为 4 000 人左右, 其目标为 8 000 名在读学生。它们的出现源于双方顶尖学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有名的是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校长杨福家。他的家乡宁波大力支持新的合作办学高校, 同时英国诺丁汉大学任命他为学校的第六任校长, 任期从 2001~2012 年。

### 近期的中美合作办学案例

美国大学紧跟英国步伐。2014 年 5 月, 我们走访了两所上海地区新建的中美合作办学高校, 上海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和昆山杜克大学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它们分别于 2013 年秋季和 2014 年秋季开始了第一批招生工作。前者由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和华东师范大学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合作办学, 校址位于上海浦东新区, 有一个曼哈顿

式的校园；后者是由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和武汉大学（Wuhan University）合办而成，校址建在上海郊区昆山市，带有杜克大学的校园特色。

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的副院长原先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他与纽约大学教务长卫周安教授（Joanna Waley Cohen）在工作上关系密切。卫周安是纽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备受尊敬的汉学家，现在居住在上海。2013年秋季，上海纽约大学首批招生300名学生，在2014年秋浦东新校区开放使用之前，这些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区上课。该校现有600名学生，2015年和2016年计划招生500名。2015年会有小部分学生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届时该校学生总数将达到3000人。一年级学生中，151人来自中国各地，65%来自上海地区；而国际学生有149名，60%来自美国。学校采用英语授课，但所有学生同时也学习汉语。课程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语言和写作技巧。所有学生都必须修两门课程：全球视角下的社会学和全球视角下的文化，他们还必须出国交换留学一个学期。短期任教的纽约大学教授占教师总数的40%，另外40%是来自国外的长期任教教师，其余20%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兼职教授。四个研究所将继续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以便两所大学的教师在神经科学、应用数学、统计化学和社会工作领域进行长期合作研究。

昆山杜克大学于2014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其中有150名修读管理、医学物理学、全球健康方面的硕士课程。与众不同的是，它首批招收的是研究生，其本科招生尚在计划中，预计未来学生总数将达到4000人。杜克大学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计划设计反

映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作为文科研究型大学的特色项目。第一个秋季学期的教学工作由杜克大学的30名客座教授担任，招聘长期教师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两个关于全球健康以及环境和能源合作的研究中心已经建立。中美关系学的高调人物——杰出的汉学家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担任常务副校长，这很好地反映了这所大学把中国的丰厚底蕴与西方惯例融合在一起的特色。

### 深圳的新举措

2014年11月，深圳主办了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第五次年会。通过参与本次会议，我们得以一窥深圳吸引合作办学大学的新举措。这座城市伴随着邓小平70年代末的开放政策应运而生，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在1992年1月再次到访深圳，并宣布中国将重新走向世界。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七位全国顶尖大学副校长的圆桌会谈，这几所大学提出了在深圳市政府指定为大学城的新城区龙岗建立几所合作办学高校，包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合作、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与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合作、吉林大学（Jilin University）与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合作、湖南大学（Hunan University）与罗切斯特理工学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合作等。所有这些合作办学都是为了响应建立小规模专业学院的号召，以解决深圳相关领域的就业需求。其目的是吸引中外优秀的学生来到深圳，并留住优秀的毕业生。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学院特

色，使深圳的合作办学模式与上海地区截然不同。也许，这就是纽约新学院（New York's New School）、奥托贝尔森管理学院（Otto Belshem Institute of Management）和苏黎世艺术大学（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的代表参加会议探讨未来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 教师招聘的难题

也许这些合作办学高校的最大难题在于招聘长期的优秀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主要

任用诺丁汉大学的教师，西交利物浦大学已成功从世界各地招募到教员。上海纽约大学目前严重依赖纽约大学的教师，同时正在对外招聘更多的终身教师，杜克昆山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吸引世界一流学者来上海任教可能比吸引他们到新兴城市深圳任教容易得多，所以，关于这些新兴的合作办学高校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拭目以待。

## 日本“顶尖全球大学”计划

Yukiko Shimmi, Akiyoshi Yonezawa

Yukiko Shimmi: 日本一桥大学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yshimmi@gmail.com

Akiyoshi Yonezawa: 日本名古屋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副教授

电子邮箱: yonezawa@gsid.nagoya-u.ac.jp

2014 年 9 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 公布了 37 所被选入“顶尖全球大学”(the “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 计划的高校。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 或是通过大学改革(如: 管理改革、经营改革、结构改革、课程改革以及招生改革等) 引领日本大学走向国际化, 政府将在十年内资助这些大学。尽管政府对日本大学国际化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现有计划存在的一些问题, 例如, 政府对大学改革的微观管理、国际化做法的刻板单一、大学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等, 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 “顶尖全球大学”计划的特色

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顶尖全球大学”分为两大类。13 所大型研究型高校被选为 A 类大学, 这类院校着重于提升大学的全球化水平, 并努力提高其在世界 100 强大学名单中的位次。政府明确指出把入选世界 100 强大学排名作为 A 类大学的量化目标之一。A 类高校包括所有七所前帝国大学、四所国立大学和两所著名的私立大学。他们将获得每年五亿日元(约合 430 万美元)且长达 10 年的资助。其他 24 所大学属于 B 类高校, 这些院校致力于借助自己的力量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这 24 所 B 类高校包括 10 所国立

大学、两所地方公立大学和 12 所私立大学。他们将获得每年二至三亿日元(约合 1.7~2.5 亿美元)且长达 10 年的资助。

较之日本高校的总预算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卓越计划, 这个项目投入的资金并不多。但与其他一些卓越计划不同, 这个项目的资金并不是直接分配到科研活动中, 而是用于大学治理、管理及人事政策的国际化和变革, 增强这些高校的国际地位, 使其适应全球竞争。这些高校也可以宣称自己是政府甄选出的国际化高校的代表, 利用自己的地位, 吸引国内和国际学生以及其他赞助者。

### 甄选方案与实施

每所大学必须提交一个战略方案, 简述他们计划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实现国际化和大学改革。例如, 顶尖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提交了一份方案, 要成为“21 世纪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大学发源地”, 并在一些亚洲国家推出卫星校园, 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提供博士课程。顶尖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所提交的方案提出通过校企合作来加强实践导向型研究。

但是, 甄选出来的高校提到的活动方案, 大部分都很相似。大多数高校都提到了不同教育方面的国际化, 包括: 提供跨学科课程、

联合培养项目，以及英语授课的课程；利用外部语言测试和研究职能实行招生改革；促进国际间科研合作，促进校企合作，利用海外研究中心优势开发国际网络；以及其他如教师和员工国际化发展的活动。

这些相似方案的提出，部分是因为政府要求申请大学填写主要活动形式。他们要根据40项绩效指标来告知其现状及未来规划。由于这些典型指标（如国际学生、出国留学交换生、高校的国际协议以及外国教师的数量等）都和国际化相关，因此这些高校也需要对各种相关活动做出报告（如提供国际学生宿舍、提供外语授课的课程和学位项目、提供各种日语课程、引入平均学分绩点系统、提供英语教学大纲、提供大学外文资讯、制定方便海外潜在申请人的招生政策）。此外，有的指标无法国际化，但却和更广泛的大学改革相关联，如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基于业绩的薪酬体系、终身教职系统，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评价体系。

## 几点忧虑

此项目对于这些大学增加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个有力支撑。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政府根据明确的绩效指标监管工费资助项目的进展情况必然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对于这个精心设计的计划的成效，笔者有几点忧虑。

首先，顶尖大学对独立性需求较强，此“顶尖全球大学”计划可能会导致其微观管理效率低下。该项目通过了学校基于自己的

任务和自身情况提交的战略计划，表面上似乎尊重了学校的自主权。但是，项目的多项指标长期受到政府严格监控与评估，实际上不利于学校自主决策的灵活性。

其次，指定的规范指标可能会导致国际化途径相似，对于那些被选为顶尖研究型“A类大学”的学校来说尤为如此。政府指标大都是量化的，以便对比各个大学的水平，但这些指标容易模仿国际大学排名中的指标。

此外，该项目的另一部分问题可能存在于日本高校中。包括这次项目资助在内，已连续获得政府对国际化的扶持资金的大学数量有限，而且这些大学都是久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虽然这些大学为了实现高校改革和国际化已经逐渐优化内部系统和行政能力，但其他大学由于获得政府资助较少，因此远远落后了。在“顶尖全球大学”计划开展的同时，政府正在开展有关功能多样化和重构整个教育体系的讨论。政府虽然很难为所有大学提供资金，以帮助它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成为国际化大学，但是如果不能为广大学生提供国际化学习环境，那将引起人们的不满。

虽然我认为此项目存在潜在的问题，但它将为选中和未被选中的大学实现国际化和大学改革提供思路和方法。大学方案和评选结果将在网上公布，大学的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也将以日英双语在网上公布。该项目的整个甄选和评估过程都将透明公开，因此政府和高校应该进一步努力宣传其在国际化改革中的良好实践。



## 新书速递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Policy Documents and Reports, 11th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8 pp. \$49.95 (hb). ISBN 978-1-4214-1637-3.

本书包含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的官方声明及意见书, 该协会代表美国学术职业。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学术自由、教师评估、教师工作、知识产权和版权、劳资谈判、歧视等。

Arabljeradmand, Ali,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ssential Top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5. 132 pp. (pb). ISBN 978-0-7618-6470-7. Web site: www.roman.com.

本书由一群伊朗学者编写, 讨论了基于国际文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但其中并未讨论伊朗的情况。

Blumenstyk, Goldie.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Crisi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6 pp. \$16.95 (pb). ISBN 978-0-19-937408-3. Web site: www.oup.com.

本书由《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资深作家编写, 用简洁清楚的语言广泛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该书讨论了成本与负债、变化着的学生数量、领导压力等关键问题, 在书末部分还讨论了“慕课”、“大数据”等未来趋

势。

Crow, Michael M., and William B. Dabars. Designing the New American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344 pp. \$34.95 (hb). ISBN 978-1-4214-1723-3.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校长迈克尔·克罗 (Michael Crow) 和威廉·达巴斯 (William Dabars) 提出了“新型美国大学”的想法, 这一提议包括创新实践、科研承诺以及对相关事务的广泛关注。他们同时也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行状态。

Cummings, William K., and Ulrich Teicher, eds. The Relevance of Academic Work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ordrecht, Springer, 2015. \$150 (hb). 252 pp. ISBN 978-3-319-11766-9.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是《变化着的学术职业》(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系列中的第13期, 广泛关注学术工作的关键方面, 即教学与科研。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 奖学金中的性别差异、政府政策对学术态度的影响、应对希腊危机、二元体系中的教学与科研等。

Farrugia, Christine A., and Rajika Bhandari. 2014.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142 pp. \$69.95

(pb). ISBN 978-0-87206-371-6. Web site: [www.iie.org](http://www.iie.org).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关于国际教育交流的年度报告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以及出国就读的美国学生的详细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有关于学生来源国、学习领域、美国院校中的留学生以及其他各种问题。

Klabunde, Niels. 2014. *Wettlauf um internationale Studierende. Integration und interkulturelle Hochschul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und Kanada*. Weisbaden, Germany: Springer Fachmedien. 410 pp. €49,52. ISBN 978-3-658-04622-4. Web site: [www.springer.com](http://www.springer.com).

本书的出版语言为德语, 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德国与加拿大国际学生的竞争趋势。该书关注两国的流动政策、国际学生一体化以及人才吸引策略。

Kehm, Barbara M., and Ulrich Teichler, eds.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vol. 2.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4. 293 pp. (pb). ISBN 978-3-934377-81-3.

书中文章由德国卡塞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Kassel) 高等教育领域的硕士生论文组成。本书讨论了肯尼亚大学的治理、黎巴嫩与越南的国际化、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等主题。

Kuder, Matthias; Nina Lemmens, and Daniel Obst, ed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Joint and Double Degree Programs*.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39.95 (pb). Web site: [www.iie.org](http://www.iie.org).

本书是新“全球视野”系列中的第一本, 由国际教育协会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联合出版, 探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紧迫问题。该书提供了对现有发展趋势的分析、院校个案研究以及有关联合学位和双学位项目的区域视角。该书也有基于学生视角的讨论及对学历评审、质量保证等问题的探讨。

Lacroix, Robert, and Louis Maheu. *Lead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a Competitive Worl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1 pp. \$49.95. (hb). ISBN 978-0-7735-4477-2. Web site: [www.mqup.ca](http://www.mqup.ca).

该书最初以法语编写, 以全球视角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及现行状态。作者讨论了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以及大学排名影响, 也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学术体系, 同时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分析主题。

Lambert, Matthew T. *Privatiz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he Bal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4. 332 pp. \$29.95 (pb). ISBN: 978-1-61250-731-6. Web 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http://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本书是关于美国私有化趋势的研究文章合集。作者对美国大学盛行的私有化风气感到失望, 同时也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公立使命进行辩护。尽管本书广泛分析了整个国家的情况, 作者也对北卡罗来纳州及弗吉利亚州进行了个案研究。

Nelson, Cary and Gabriel Noah Brahm, eds.

The Case Against Academic Boycotts of Israel.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52 pp. \$34.99 (pb). ISBN 978-0-990331605. Web site: [www.wsupress.wayne.edu](http://www.wsupress.wayne.edu).

由于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在美国境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所以美国对以色列进行了学术抵制。本书包含了一系列反对进行以色列学术抵制的文章和声明。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4. 567 pp. (pb). ISBN: 978-92-64-21132-2. Web site: [www.oecd.org/pub-lishing](http://www.oecd.org/pub-lishing).

本书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最具标志性的年度数据报告，囊括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小部分其他国家教育的方方面面，提供了 100 多个教育方面的统计数据。这是有关 34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十几个伙伴国家最为全面综合的教育数据

